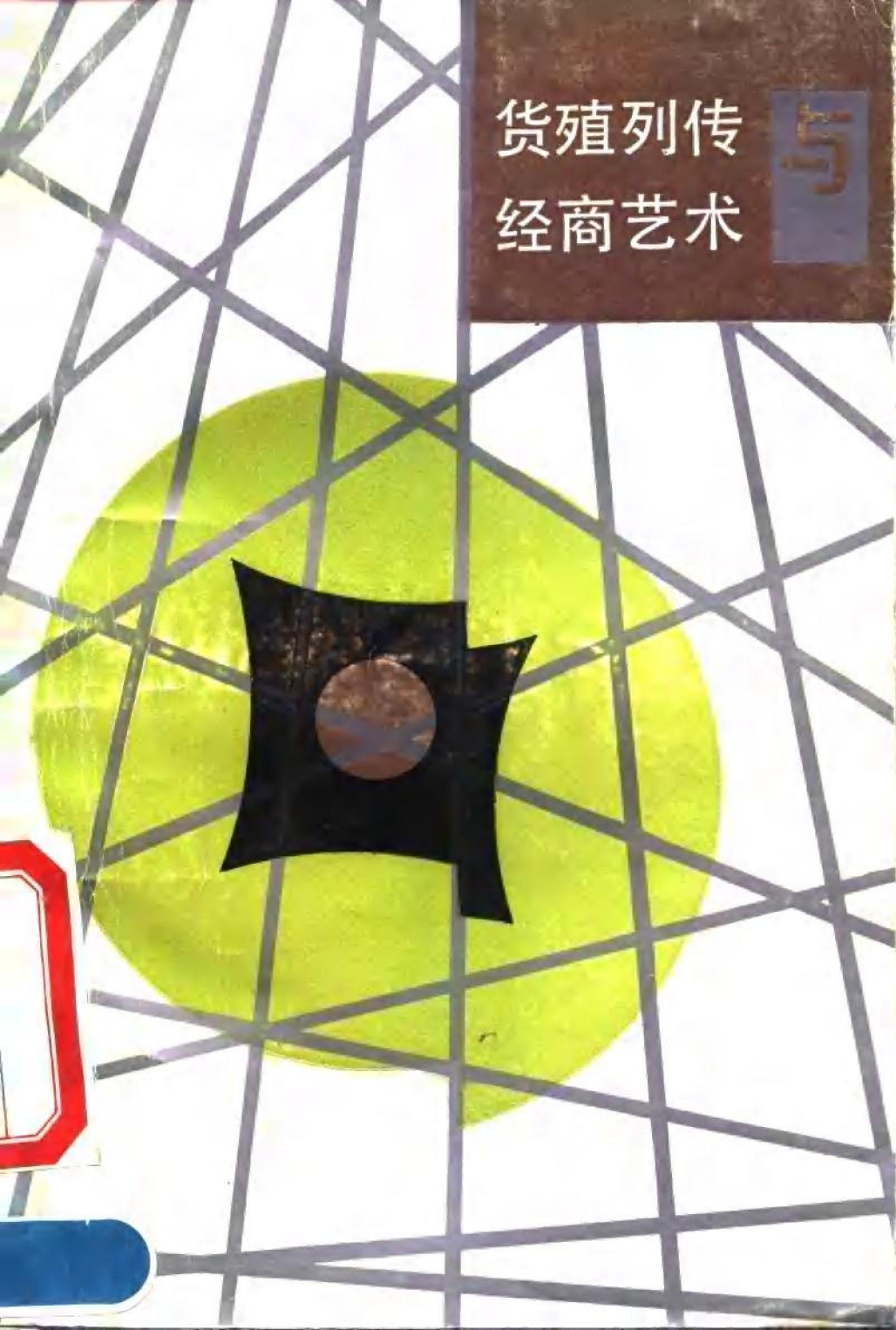


货殖列传
经商艺术

与



货殖列传与经商艺术

王双 著
王文治

096/20



中财 B0034526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

总号 393935

书号 F129.18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01号

王双王文治著

200005☆

繁殖列传与经商艺术

王双王文治 著

200005☆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南宁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8.25印张 插页2 146千字

1991年元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4,006—12,205册

ISBN7-219-01763-4/F·134 定价：3.90元(平)

ISBN7-219-01765-0/F·135 定价：7.00元(精)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篇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 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 ——重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扬弃“讳言财 利”的传统观念.....	(9)
一 “商不出则三宝绝” ——商业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桥梁.....	(13)
二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物质生活充裕后，才谈得上文明礼貌和道德 修养.....	(18)
第二篇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根据主客观条件，作出最佳战略选择.....	(23)
一 “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财产是选择求富之道的出发点.....	(26)
二 “有所试”，“试有所长”，“非苟而已” ——注重从实际出发，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37)
三 “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 ——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	(45)

第三篇 “知斗则修备”

——重视市场调研和预测……………(55)

一 “乐观时变”

——注意观察市场形势的变化……………(58)

二 “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根据商品供求的变化，预测市场行情……………(70)

三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在调研和预测的基础上，结合本身条件作出
决策……………(78)

第四篇 “富者必用奇胜”

——经营致富必须靠出奇制胜……………(83)

一 “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

——适应市场变化，搞好购销业务……………(86)

二 “二十病农，九十病末”

——定价要兼顾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100)

三 “务完物”

——优质方能取胜……………(113)

四 “无息币”

——防止商品积压……………(129)

第五篇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趋利求富是人之常情……………(139)

一 “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

——增加学识和扩大影响，是经商致富的重要条

	件·····	(141)
二	“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 ——搞好公共关系，争取各界支持·····	(149)
第六篇	“智”、“勇”、“仁”、“强” ——企业家不可缺少的素质·····	(157)
一	“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 ——讲求经营谋略，运筹定计，依法办事·····	(160)
二	“计然之策七·····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要善于学习借鉴，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169)
三	“宁爵毋刀” ——士为知己者用·····	(177)
附录	一 《货殖列传》原文及注释·····	(191)
	二 《货殖列传》译文·····	(238)

引 言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虽然有封建性的糟粕，但同时也有大量民主性的精华。对其中的糟粕，我们当然应该拒绝并予以批判；对其中的精华则应该肯定、继承并加以借鉴。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已提出过并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原则。

曾经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作者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他不仅是中国的史学巨匠，而且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承袭父职为太史令，并继承父亲的遗志撰写《史记》。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由于替投降匈奴的将领李陵说情，司马迁获罪下狱，翌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宫刑）”。直到汉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才被赦出狱，担任通常由太监承担的中书令。这在当时被看作奇耻大辱，但是为了编写《史记》，司马迁“隐忍苟活”，终于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完成了这部著作。

司马迁早年曾先后就学于当时著名的学者孔安国和

董仲舒，20岁以后开始游历，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他进入仕途之后，又多次随汉武帝巡幸全国的名山大川，并奉命视察过巴蜀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民俗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又由于他对先秦和汉初的历史知识造诣颇深以及由个人政治上的不幸遭遇所形成的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因而能清醒地认识现实，正确地分析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他以前的社会，在《史记》中较为客观地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近三千年的历史事实，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其中《货殖列传》是记载商人活动和经商艺术的名篇。

所谓“货殖”，意思是指经营货物，用以滋殖财富的经商活动。这种经商活动的范围，除一般商业之外，还包括手工业、农副业、畜牧业、矿冶业等。在《货殖列传》中，记载了先秦及西汉时期的包括农、牧、工、商各个方面卓越人物的经营活动、经营思想和致富策略，既论述宏观的富国之策，也涉及微观的治生之术。其中对“货殖家”，即那些经营商业、手工业和农牧业的出类拔萃者的观察十分精深，并把他们那些丰富多采的经营实践凝炼成经营理论来加以介绍，其间既灌注有民主精神，又熔炼了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精华。

西汉时期，“崇本抑末”的传统观念浓重，社会习俗轻商，一般士大夫对于商人及其买卖活动是不屑一谈的。而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但让地位卑微的商人同帝

王将相、诸子百家一样在书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还特地为他们辟章立传，这在当时及其以往，甚至后世的史学家中都是不多见的。司马迁为什么要给商人单独立传？在《货殖列传》中作者自己曾有过解释。在介绍过先秦及西汉时期一些商人的主要经营活动之后，司马迁曾不无感慨地指出，这些商人第一没有领地和俸禄提供收入，第二手中没有权势可以用来玩奸弄法，第三没有去干杀人盗墓伤天害理的坏事，然而却能凭借经营本领积累起巨额的财富。对于商人们“变化有概(策略)”，善于根据形势变化而灵活变通的才能，司马迁非常赞赏。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为什么要写《货殖列传》这一点说得很明确：“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增殖)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身为布衣百姓的商人，不危害官府，不伤害百姓，却能依靠适时买进和卖出来增殖财富，很值得聪明人去效法。可见，借鉴这些商人的谋生本领和经商艺术，启迪人们的智慧，是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的目的所在。

众多的史料证实，司马迁的一片苦心并没有白费。两千年来，《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著名商人和他们的经商艺术，一直是后世商人推崇的样板，无论是“与时逐”，善于因势利导而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或是“臆则屡中”，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因而能“结驷连骑”地去访问各国，并得到国宾的待遇，国君与之“分庭抗礼”的端木赐(子贡)，还是“乐观时

变”，重视搜集市场信息，而被同行尊奉为祖师的白圭，都是后世商人效法和学习的楷模。在旧中国，不少商人常用“陶朱事业”和“端木生涯”作为条幅高挂在店堂里显眼的地方，以表示自己的追求。这都是《货殖列传》影响深远的证明。近世以来，《货殖列传》所记述的经商艺术，不仅在东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在西方也被一些人应用于商业实践，并取得良好的经营效果。

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如何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就成为经理和厂长们越来越关心的问题。向国内外同行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理论和经商艺术，当然是必要的，与此同时还应该发掘和借鉴古人的经营理论和经商艺术。国内外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当然，现代经营和传统经营毕竟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在充分考虑今天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吸收传统文化中那些有用的成分，而绝非不加分析地食古不化或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绝无门户之见，只要是好的、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学习，都吸收，对古代优秀的商业文化遗产——《货殖列传》，也应如此。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研究《货殖列传》中的经商艺术，挖掘那些有益于搞好企业经营管理的宝贵经验，并与中国近代、当代以及世界各国企业经营成功的事例相印证，为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一些可资参考和借鉴的东西，为研究我国传统文化添上一砖一瓦。我

们愿和热心探索此道的同志们一起，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商艺术而共同努力。

书中所引《货殖列传》原文，出自《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所列举的资料，均引自公开发表的书报刊物，因为数量较多，恕我们不一一列举原文的出处。在这里，谨向原作者致谢和致歉。

本书第一、二、五、六篇的执笔人为王双，第三、四篇和注释、译文的执笔人为王文治。最后由王双总纂定稿。

第 一 篇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
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
不出则财匱少”**

——重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扬弃“讳
言财利”的传统观念

司马迁把农、工、商、虞(古代主管山泽生产的官吏)四大经济部门相提并论,他认为农业生产搞得不好,人民就会衣食匮乏;没有手工业产品,各项生产事业就不能发展起来;商品不流通,人民衣食制品等就断绝了供应;林业矿业不开采,资源就缺少。这四大经济部门都是“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因此他主张让人民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这种思想在他的时代是一种积极、开明的思想,但以儒家的正统观点来看,就恰恰相反,认为“是非颇谬于圣人”。

孔子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是儒家的正统观念,其主张少言财利,只赞成宣扬命运与仁德。孟子也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明确地反对涉及任何“利”的范畴。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董仲舒更把“利”看成洪水猛兽,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不能止也。”主张用教化堵塞人民追逐财利之心。班固在《汉书·货殖志》中说:安定的社会全仗“在民上